

## 「白澳」時代下的華裔澳洲人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 xiv+289pp.

郭美芬\*

近年來華裔移民澳洲史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取向：第一是華裔移民對澳洲國家認同的影響；第二是強調澳洲多元文化價值下，華裔移民的歷史遺跡與文化遺產；第三則著重於整理澳洲國家及州政府檔案中的華裔移民史料。然而，由於研究者對於華文資料掌握能力的不足，這三類研究都無法深入瞭解華裔移民的心聲。

澳洲學者費約翰教授(John Fitzgerald)於2007年出版《瀾天大謊：華裔澳洲人在白澳》(*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一書，這是澳洲學界首次引用華文歷史檔案與報紙資料，寫成「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下的華裔移民史。費教授對澳洲華裔移民的研究，挑戰了深植於澳洲社會的「白澳」觀念與種族偏見，他認為華裔移民應獲得與英國及愛爾蘭移民一樣的歷史地位(頁52)。此書不僅是反思澳洲歷史與國家認同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涉及泛太平洋地區排華運動的歷史，然而本書不像過去的研究著重於重現華裔族群的歷史經驗，而是企圖開啓新的研究趨勢：二十世紀國家權力對於

---

\* Australian Endeavour Research Fellow, Asian Studies,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全球架構與族群移動的歷史影響。

本書共分九章，主要書寫 1850 年代到二次大戰前華人移民澳洲的歷史，並論述華裔移民與澳洲主流社會一樣，也在現代化的進程裡，追求平等、自由與民主。第一章、第二章檢討了澳洲學界的現象，作者認為澳洲學者在討論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的「白澳政策」、澳洲國家價值與移民政策時，過分集中在政策與理論的辯論，卻對那段歷史缺乏深入瞭解。1880 年代後泛太平洋地區的排華風潮，影響到 1901 年澳洲聯邦政府成立時的基本國策：白人至上。相較於當時美國的排華法案以及加拿大、紐西蘭的人頭稅，澳洲聯邦政府限制中國移民的策略，是採取以聽寫測驗(Dictation Test)及「回頭紙」(Certificates of Domicile and Certificates Exempting from the Dictation Test)的相關行政規定，這些規定不僅讓已經在澳洲定居的華裔移民成為澳洲國家建構過程裡的「他者」，也阻止了新移民的加入。近年來澳洲學者 Keith Windschuttle 企圖為「白澳政策」緩頰，辯稱「白澳政策」並不能歸咎於澳洲政府的種族偏見，而是因為非歐裔族群無法認同澳洲價值，因此在澳洲聯邦建國之初，才會將非歐裔族群排除在外。費教授反駁了這樣的論點，他嚴正指出，持此論調的學者所指稱的是一種沒有歷史根據的假設，缺乏歷史的見識，他們只是將「白」澳從字面上移走，卻沒有真正移除對亞洲族裔的種族偏見與誤解（頁 2-3）。

在第二章中，費教授繼續駁斥近年來學者企圖合理化「白澳政策」的偏頗之處。他提出了幾個理由：首先，澳洲國家價值“Freedom, Egalitarianism and Mateship”其實就是啓蒙時代以來人文主義者所宣揚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與博愛(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頁 25），「白澳」謊言就在於以澳洲特色去定義本該是普世共享的現代社會想像與價值。費教授在書中以澳洲海關企圖拒絕康有為入境的歷史案件來證明這一點：二十世紀初，康有為受到澳洲保皇黨的邀請，有意造訪澳洲，然而澳洲海關官員收到通知，奉命在聽寫測驗中，加入康有為陌生的西班牙文或是義大利文版的測驗內容，盡一切可能來阻擋他進入澳洲。儘管澳洲拒絕康有為的入境與其他移民的考量有所不同，然而費教

授以此為例，說明了澳洲聯邦政府如何以行政權力設計了聽寫測驗，並以此來限制非歐裔移民，和這些移民能否接納普世價值根本毫無關係。緊接著，費教授又以數據精彩地反駁了將澳洲華裔移民視為「淘金客」的錯誤認識。過去澳洲主流社會總是以數據來證明，中國移民返家的比率高過英國與愛爾蘭移民，進而宣稱，華裔移民並無意將澳洲視為家園。費教授認為，這套論述其實忽略了一點，即移民的移動也會受到地理空間的影響。在澳洲的英國與愛爾蘭移民礙於地理空間的阻隔，因此返家的比率才會低於華裔移民。費教授進而舉另一項數據指出，如果以在美國的愛爾蘭移民返家比率與在澳洲的中國移民返家比率相比，我們會發現兩者其實差距不遠。因此費教授認為，澳洲華裔移民的高流動率應該被視為全球歷史發展下的一個現象，而不應被過於簡單地詮釋成華裔移民只是出洋到澳洲的淘金客，何況中國也不見得是他們旅程的終點。

在接下來的幾章中，費教授論述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華裔族群如何將澳洲的國家價值落實到他們新興的社會組織與網絡中。在第三章裡，費教授首先論述，早期華人礦工的社會組織與移民網絡，係採取同鄉會及秘密社會的模式，這兩種組織型態主要依賴親屬關係和手足義氣來團結華裔礦工。在這些社會組織中，費教授認為流傳在十九世紀中葉，新南威爾斯省的中國礦工間有關「義興公司」（洪門的分支之一）領袖的傳奇故事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傳說原本只流傳在華裔移民間，但是一名澳洲華裔新聞記者周成貴(Vivian Chow)以此為主題，在1930年代的一份名為《團結中國》(*United China*)的上海雜誌發表了數篇文章，也讓我們能以全新的視角來認識華裔移民。周成貴在文章中指出，十九世紀中葉「義興公司」在澳洲鄉村與礦區建立的網絡與影響，透過返回香港與廣東的澳洲華裔移民，孕育了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共和革命。而費教授也查證了周氏文章中的義興領袖龍興邦(Loong Hung Pung)，確有其人。透過該文，費教授不僅進一步考據了十九世紀中葉華裔移民的社會網絡，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周氏的書寫相當清楚地展現了華裔移民對於澳洲的認同，儘管他們的聲音被掩藏了數十年，但這些故事與傳說如今應該被視為澳洲

拓殖與開墾歷史中的一部份，華裔移民與澳洲社會一起追尋著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美好價值。

在第四章中，費教授論述當澳洲淘金的熱潮退去，「義興公司」也面臨了轉型的挑戰。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礦業逐漸沒落，東部港口則發展成為太平洋地區的商業中心，許多鄉村與礦區的移民紛紛移居至此。在這一段社會轉型的過程裡，費教授特別論及華裔移民與澳洲殖民社會的其他族群一樣，深受「體面」(respectability)概念的影響（頁 82）。由於對自己認同的改變，同時也為了得到殖民社會的公平尊重，華裔移民開始強調自己是守法的公民，華人傳統的「面子」觀念從中也與澳洲殖民社會法治的「體面」概念相揉合，進而改變了澳洲華裔移民的價值觀。費教授認為，唯有理解到華裔移民價值觀的改變，才能深刻地解釋為什麼二十世紀初開始，「義興公司」從新南威爾斯省的鄉村礦區轉到濱海港都雪梨時，必須轉型為一個現代化與公開的組織。

第五章主要論述 1901 年澳洲聯邦政府成立前後，澳洲華裔族群開始重視「平等」的價值。華裔移民透過領袖與商業菁英的投書與陳情，分別向澳洲與中國主張享有平等對待的權利。透過這些投書與陳情，以及當時雪梨保皇黨的機關報《東華報》的論述，費教授認為，澳洲華裔族群開始主張平等的價值應該落實到法律層面，也就是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這樣的想法也影響了 1900-1901 年間造訪澳洲的梁啟超。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費教授並沒有進一步探究華裔族群本身對於「平等」這個議題的爭論，也忽略了聯邦政府的「白澳政策」其實分裂了華裔移民內部的派系。澳洲華裔移民在白澳時代下，其實面臨了多方的衝擊與考驗，澳洲新興的政治價值以及商業資本社會的階級劃分，也影響了華裔族群自身的認同危機。在傳統與現代的生活形態間試圖尋找平衡點的他們，對於何謂「平等」的價值，其實一直是紛擾不休的。

在本書第六、七章中，費教授再度以華裔移民的新興組織，探究華裔移民的歷史如何反應了現代澳洲國家的形成。這兩章的重心主要在討論以雪梨為根基的澳洲國民黨，如何從 1915 年起成為一個跨國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

化的社團組織。費教授分析了雪梨國民黨的領導階層，他發現國民黨的政治組織其實是建立在華商之間的跨國性網絡。也就是說，從 1910 年代末期開始，澳洲華商在上海、香港和泛太平洋島嶼間的生意，以及首次由澳洲華商共同運作的中澳輪船事業，讓他們彼此緊密結合在一起。國際間的網絡以及跨國商業需求，也就進一步促成了國民黨在澳洲與泛太平洋島嶼的建立。因此，費教授認為，澳洲與太平洋的國民黨是「一個移動者的社團組織」（頁 176）。

費教授在評論澳洲國民黨的發展時，指出其壯大與衰退深受中國國民黨內部決策的影響。他認為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以及勞工政策，促成了 1920 年代澳洲黨員人數的成長（頁 135-136）。根據 1925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所提供的海外黨員資料，澳洲是海外黨員人數唯一增長的地區，費教授推斷黨員之所以會增加，是因為雪梨黨部擁戴孫中山的政策。然而，作者在這裡所引用的數據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他引用的數據原為 1923 年澳洲國民黨回報的數目，而在這份原始文件中，澳洲國民黨其實呈報了兩種數據，一種是「曾在的」黨員人數，另一種則是「目前的」黨員人數。<sup>1</sup>1924 年澳洲代表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是以「曾在的」黨員人數回報，這是指從 1915 年後陸續加入的黨員人數，並不是當時確切的黨員人數，也無法證明澳洲國民黨因為孫中山的聯俄容共而增加黨員人數。另一方面，費教授並沒有對 1920 年代澳洲國民黨的組織改造提議多所著墨，但這當中包括了鼓勵開放女黨員入黨，以及要求以委員制的方式恢復國民黨海外部的運作。再者，就像費教授所言，做為一個移動者的社團組織，澳洲國民黨當時的成功在於對黨員身分的開放以及跨國網絡的建立。然而，當時政治社會狀況的複雜性，以及華裔族群不同團體間的合作與衝突，也是影響澳洲國民黨發展的重要因素；或許因為篇幅所限，費教授對此也未詳細論及。

費教授之所以花費兩個章節來細述澳洲國民黨的建立與發展，主要著眼於這個政黨的建立，足以證明澳洲華裔移民確實具備了現代化的組織思想，以及

---

<sup>1</sup> 〈雪梨支部及所屬分部註冊報名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檔號：般 415-11。

跨國間移動的能力；他們的歷史對澳洲社會的意義，並非只是宣揚多元文化價值而已，在澳洲的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裡，他們同樣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接近尾聲的第八章，費教授再度提醒我們，華裔移民在二十世紀初得以建立自由與公開的團體，是因為澳洲社會所建立的價值與影響，以及其所提供的安定與法治的基礎。以雪梨華商的歷史經驗為例，費教授指出儘管在「白澳政策」的抵制下，華裔移民依舊透過這些不同的團體，跳脫傳統家庭式的管理與網絡，逐漸擴大其資本投資與商業網絡，因此得以聯手在香港與上海建立起四大跨國公司。而這些跳脫傳統親屬與地緣關係的組織和商業合作，也培養了一批跨國性的澳洲華裔商業菁英，造就了他們事業的成功，而他們也繼續影響著他們的後代，持續在澳洲與世界間，建立跨國的網絡與認同。

在最後一章，費教授綜合前面的歷史敘述，更清楚地反駁了「白澳政策」所指控的「非歐裔移民無法分享與想像澳洲的國家價值」，認為這是一個沒有歷史根據的謊言。費教授以華裔移民的新興社團組織與網絡，指出他們既分享也致力於維護澳洲所信仰的國家價值，他批評「白澳政策」其實是澳洲新興聯邦政府在想像與建立新國家時期，以國家行政權力定義、創造出自認具有「澳洲特色」的「普世價值」，其真正企圖是阻隔非歐裔的移民族群，建立一個只有白人的澳洲。在這樣的國家意象之下，所謂的澳洲國家價值終將只是盎格魯薩克遜的遺產、權力的象徵符碼，根本不是什麼值得追尋的普世價值。然而，費教授也樂觀地認為，透過歷史的不斷書寫，國家權力造就的謊言仍可被駁斥、拆穿。

澳洲華裔移民的歷史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並不是因為澳洲在歷史上擁有數量眾多的華裔移民，而是因為華裔移民對於澳洲在二十世紀建國與認同的過程中，是以「他者」的角色影響著澳洲社會的基本國策與國家想像。<sup>2</sup>而費教授的著作提供了反思澳洲國家認同的另一個歷史角度：在高舉多元文化融合的

---

<sup>2</sup> Adam McKeown, "Introduction: the Continuing Reformulation of Chinese Australians," in Sophie Couchman, John Fitzgerald, and Paul Macgregor, eds.,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Kingsbury: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2004), p. 3.

澳洲社會中，應該了解到歷史中的華裔移民並非僅是「他者」，而也是澳洲社會的成員之一，與其他族裔共同創造了澳洲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不應一邊宣揚澳洲的多元種族觀，卻又一邊鞏固「非歐裔族群不能認同澳洲國家價值」的偏見。

然而本書也有其美中不足之處，費教授希望賦予華裔族群新的歷史地位，但是以澳洲國家價值來定位華裔族群之際，卻沒有深刻地細述華裔族群在同化於澳洲社會過程中的衝突與掙扎。再者，費教授著重強調以雪梨為根基的跨國華商的成功，但卻遺漏了其他華裔階級與社團組織，在白澳時代下也開始重新詮釋傳統的鄉土主義，並建立了與華商迥異的社會網絡與國家認同。

儘管如此，本書作為第一本試圖扭轉華裔澳洲人歷史地位的著作，費教授的用心與企圖應該給予肯定，相較於過去研究澳洲華裔歷史的其他著作，本書更注意華裔族群自身的聲音，也因此引起澳洲學界以及研究華裔離散學者更多的關注。傳統談論海外華人時，習慣以親屬跟地緣關係來分析其社會組織，但是費教授的著作跳脫了這種觀點，強調華裔族群在現代化過程裡所建立的社會組織與網絡，其實有其特定的歷史與文化意義。費教授以分析跨國移動網絡中的文化歷史意義，去理解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裡，國家權力的操作與個人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二者如何相互作用。他的歷史書寫所展現的，不僅僅是澳洲或海外華人的歷史，更是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現代社會想像與移動的社會文化史。本書榮獲 2008 年澳洲歷史學界最高榮譽的 Ernest Scott Prize，正可謂實至名歸。